

四十年前天主教人士參加抗戰工作之一斑

方 豪

前 言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抗日戰爭爆發，至今年七月七日，已屆滿四十年。抗戰歷時八年一個多月，不但在中華民國史上佔極重要的位置，即對五千年的中國歷史而言，八年一個多月，所佔比例雖小，却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。

試思近百年來，無論雅片戰爭、英法聯軍、中日甲午之戰，乃至於八國聯軍，沒有一次逼我們把首都遷得那麼遠，非但到了重慶，在最緊張時，甚至有遠避成都、西康之議；敵騎所至，歷史上也從沒有由平、津、上海深入到貴州獨山的；最大的困難，是海、陸、空運輸幾於完全被切斷；而敵機的濫炸，更造成空前的慘劇。有時敵機只要一、二架凌空，我們整個的防空區即警報大作，一切停頓，百業隨之而癱瘓，敵機如入無人之境，至今回憶，猶憤憤不已。

八年抗戰，亦名為全民抗戰，正是地無分前線或後方，人無分男女或老幼，甚至於地無分海內、海外，一致自動動員。我今已是望七之年，但自問一生中，如果不能躬逢那抗戰前準備期，朝氣勃勃的十年，不能親歷神聖抗戰中炮火連天的八年一個多月，此生將成爲庸碌的一生、平凡

的一生、無意義的一生。我既有此幸運，得追隨教中先哲，略盡棉薄，當此四十年，不可無記，一切均據私藏資料如函札之類，多屬罕見稿與未刊稿，敬請讀者指正。

一、百歲老人馬相伯先生勸國人奮起自救

上文我說抗戰的最好表現，是全民抗戰，男女老幼，無不投入此一行列。時馬相伯先生已九十八高齡，乃仍於七七後二日晚廣播「鋼鐵政策」。

十月三十日，政府既決定遷都重慶，十一月十二日，政府、親友、門生都主張先生應往西南暫避，原定目的地爲昆明，既至桂林，廣西省政府堅決挽留，住風洞山，距明末瞿式耜先生殉難處，近在咫尺。廿七年我由浙入滇時，在桂林句留旬日，曾前往拜謁。

二十八年四月五日，先生壽登期頤，政府頒褒嘉令，有以下數語：

「近自禦侮中興，入佐中樞，秉老當益壯之精神，參抗戰救國之大計，忠忱碩望，宇內同欽。茲已壽登百齡，襟懷豪邁，無減當年，匪惟民族之英，抑亦國家之瑞」云云。

同日，我在昆明益世報爲先生出一特刊，蔡元培先生自香港寄來親筆賀詩一首，至今珍藏弗失。詩曰：

百年自昔誇人瑞，學選神完更足珍。
伏勝授書能啓後，武公善誥助親仁。
猶因愛國抒宏論，不爲悲天擾性真。
願藉臺萊歌樂只，八年常與歷秋春。

實則，自九一八事變後，先生即以當時所有大眾傳播工具，喚起全國人民「自救」。民國二十一年雙十節，先生九十三歲，題「還我河山」四大字，並跋其後曰：

「去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暴力發動強佔我東北；今年三月，又一手演成滿洲偽國傀儡一劇。一週年間，河山變色，如此奇恥大辱，國人應奮起自救，不還我河山不止。」

相伯先生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晨在諒山逝世，未能目睹勝利來臨。時陸徵祥以本篤會修士晉升司鐸，隱居比國聖安德修道院，接到噩耗，特將前文譯爲法文，向所有外國朋友，普遍分送。以其崇高之聖職，優美之法文，其受人重視，可想而知，對祖國宣傳，貢獻至大。
駐比大使金問泗，對相伯先生自稱「受業」

書陸氏所撰挽聯曰：「一思一語一動，愛主愛國愛人」陸氏並自譯為法文曰：ETRE UN, DE PENSEE, DE PAROLE ET D' ACTION AIMER DIEU, AIMER LA PATRIE, AIMER LE PROCHAIN.

二、雷鳴遠神父手書「生於憂患」

今年為比國入籍教士雷鳴遠神父百歲誕辰，六月二十五日全國各界舉行紀念會。雷神父熟讀四書，又所寫毛筆中國字，流利而有勁。最近若干紀念文字中，常見有雷神父所書「生於憂患」四字，見者多不知其在何地？為何人？在何種情

生於憂患

在元六六
雷鳴遠

形下？書此四字。

按四字寫於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，其時雷神父正以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主任的身分，從中條山前線，來昆明小住十日。主要目的是為前線傷兵捐募藥物，尤其是雲南白藥。

二十八年元旦起，益世報創刊了晚報，一日忽得一小朋友投稿，自稱九歲童，編輯部同人頗

多將信將疑，於是在某一晚上八時左右，推我偕同兩位記者根據所書通信處前往訪問。是一小女孩姓吳，已入睡，母親見我們去訪，即知來意，問我們要不要叫她起來，當面考一考，我們正說明天再來，小女孩已起床，並拿出一疊稿紙，說：「如各位伯伯叔叔認為還可以，我想陸續發表。」我一看題目，是「小難民日記」。她立即去拿筆，寫了一段「我投稿的目的」，大意是在「鍛鍊」云云。我立即取回。

「小難民日記」大約有七八萬字，次日我一口氣看完，一路所見難民的流離失所，傷兵的斷腿缺臂，以及軍箱的擁擠，轟炸的恐怖等，都虧

她一個九歲的孩子，很天真的描寫出來。午刻她也到報館等消息，正巧雷鳴遠神父在座，我問她要不要請雷神父題幾個字。其時雷神父在昆明西南聯大、雲南大學等處，演講無虛日，婦孺皆知其名。雷神父見了她以後，立即要了毛筆，毫不思索的寫下了這四個字。句出孟子告

子章下，原文是：「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。」足見雷神父對我國經書之熟，而以此四字，題於「小難民日記」，亦恰到好處。原來這孩子的父親是雲南人，母親是江蘇人，八二三以後，母親就帶着她們兄妹幾個人，千山萬水的跑回雲南老家。

不久我即將此書寄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，現在我自己身邊一冊也沒有了。像這樣在抗戰炮火中成長的孩子，全國正不知有多少。

三、國民外交與官方外交的羣策羣力

二十七年十一月初，我到了昆明，十二月八日益世報復刊；不久，于野聲主教即赴美從事國民外交。臨行送給我一些文件，並說你喜歡歷史，一定保管得好，也許對你將來有用。果然將近四十年，我始終未予公開。「東方雜誌」索稿，指定要和抗戰有關。我想時機已經到了，而且再不發表，若干鉛筆字恐將不能辨認。

文件裝在一信封中，是蔣百里先生給于主教的。正中是「野聲主教台啓」六字，左下方為「百里謹干」四字。信封、信紙用的都是羅馬維多利亞旅社的 (Victoria Hotel, Roma)。信如下：

「野聲先生座右：弟於十五晚至羅馬，晤史、朱諸公，知英義商約業已簽字，政治談判，亦尚順利。史氏且有英義接近，義德將疏之可能說，因電委座，謂此時對義外交上可設法進行，至少可減少敵方若干力量。頃得覆電贊成，有『及時運用』之語。現已約外次於星期一作初次談話。惟弟所希望者有三事：(一)此次對義外交，根於英義妥協，公能否採聽英方意見，使不致吃醋，且能從旁為我助成交融否？(二)英義妥協，能到如何階段？(三)比聞法有增兵西班牙之說，英義兩方均避免直接談判，免起衝突，雙方均有坐

待事實之勢。(三)弟擬廿四、五由此間道出柏林，歸巴黎，俟公來義時，下月十號左右再來義，以便於進行上有利，并希望公致書於前所介紹之議員，請其設法對墨氏間接表示，不可輕易放棄中義邦交。現在中國抗戰勝利日有進步，中央政治軍事力量較前統一，共黨決無在中國成功之可能等意，以作一將來說話之基礎。至對外次談話結果，屆時再當函告。專此敬請道安。弟方震頓。

覆書請寄巴黎使館轉。」

以上蔣百里先生親筆原函及信封都是用深色鋼筆寫的，所以至今非常清晰。但在信封內夾有一鉛筆寫的電報稿，文如下：

「外交部并轉呈蔣委員長、汪主席：日本宣傳我容共甚力，如與教廷換使，不攻自破。顧少川大使完全同意。可否進行？乞即電示。陳公博、蔣方震、于斌、劉文島。」

另有陳公博以鉛筆寫在一信封前後的短信，非常草率，信封本已是深灰色，鉛筆顏色又淡，勉強可認，文如下：

「十分對不住，弟不好過違醫生之命。教廷之事，弟已函劉大使電部請示。因少川已完全同意，弟已同意也。內容請與少川一談。為成此事，在外諸人已告成功，只視部方意見如何耳。弟失眠已久，加以應酬太多，而消息又惡，而又自負身體太強，致有今日突然而來之病，大概星一可以出院矣。此請道安。

聖誕後弟即歸國。又及。博。」

從以上這些從未發表過的文件，可看出抗戰之初，我們的外交非常積極。一方面我們要極力拆散德義和德日義軸心；一方面我們要爭取教廷。不幸我們晚了一步，德義聯盟，在蔣、于等到達歐洲開始努力時，墨索里尼已定為國策。而中國與教廷的建交，亦終於落在日本之後，但外交界與民間奔走効力的人士，實已盡了最大的努力。

四、外交退隱者宿海外不忘國難

當抗戰爆發之時，外交界前輩陸徵祥，雖隱居海外，但時時想念祖國，屢索抗戰宣戰書刊，並譯成法文，在法文地區國家，廣為宣揚。

二十九年一月廿八日致蒙親筆函中有云：

「在比之法文益世通訊，因戰事暫停，而零星小冊，實無資料，亦屢思屢擱。蓋無相當價值之宣傳，難博讀者之注意。愛鐸(愛德華)欲將汪逆搗亂出一小冊，詳告以事屬把戲，不值得辯論，反使人重視汪之行動，實毫無關係之幼稚行動。質諸高明，諒以爲然也。……祇請道安。同道弟陸徵祥拜啓。再者：尊孔敬祖先，祖國禮節原無宗教意義，現經教廷圓滿解決，足爲公教前途賀。祥又及。」

陸公在抗戰之初，即非常推重于野聲主教，而常在友人之間，爲之吹噓。廿八年五月三十日致蒙函中云：

「野聲主教乃應時而出，合時代教區領導，聖年(一九二五)識之於永城，早知不

久爲公教增光，而今抗戰建國，發揮懷抱，爲國宣勞，東西奔走，令人欽佩拜倒。凡我公教同胞均應一致擁護。異日政教合作，大時代之新中華，當可拭目以俟之。全在我人之善自爲耳。質諸高明，以爲何如？」

陸公之推重于氏，實以抗戰建國爲前提，情見乎詞。且爲之介紹外交界前輩，曾親筆開列名單，(西文名從略)如下：

郭泰祺，復初，湖北廣濟，年五十。

顧維鈞，少川，江蘇嘉定，年四八。

王正廷，儒堂，浙江奉化，年五六。

錢泰，階平，浙江嘉善，年五一。

胡世澤，子澤，浙江吳興，年四六。

以上五使均係廿餘年同部至交，倘我公乘機結識，異日在政界中，亦可多幾位友朋，於公於私，均不無便利也。祥又識。」

此一名單亦保存在蒙處。

二十七年復活節，陸公本有一篇印就的中法文對照的公開信，以表明其「藏拙修院」(身託比邦，心存祖國之區區微意)其時尚在抗戰前夕。次年，陸公寄來一份，親筆加題於上云：

「近日報傳戰事順利，南院長暨愛鐸羣形於色。祥亦藉以快慰，但望堅持到底，以得最後勝利，民國民族幸甚！徵祥藉識。」可見陸公以在海外修道之身，仍無時不以祖國安危爲念。足見全民抗敵，爲鐵的事實，且出於一片愛國至誠，未嘗有絲毫勉強也。

五、益世報的復刊與在渝的艱苦情形

今年二月廿七日，所謂「全美華人協會」(親共團體)，在「華盛頓郵報」刊登全幅廣告，呼籲美國早日承認中共，其中竟有若干「院士」。於是或加以「叛國」之名。實在他們在廣告中一再自稱「華裔美人」(We Chinese Americans)，似頗以此自豪，故「叛國」之名，實無從說起。益世報創辦人雷鳴遠神父，却一直以「比裔華人」自豪，並自恨鼻太高、眼太藍、青色不夠黃。九一八後，即屢組救護隊，在長城各戰役中，盡其救國救人的天職；七七事變後，一方面仍號召教友及其會中兄弟(修士)親上前線，以擔架隊救護傷兵，一方面則力謀益世報復刊。我收藏的廿七年九月十九日雷神父在漢口致于主教函中說：

「至愛至敬主教鈞鑒：聞益世報復活，喜而不寐，感謝主恩，感謝我好主教。今日再見委座，與之長時談話，結果出洋暫緩，全力擴大前方救護工作及青年精神訓練，故現留此加詳計劃一切及開始工作。雖萬分希望拜吾親愛極敬主教教義，現尚不能去，飛無錢，陸路又太費時間，等機會吧！然當與我主教面商求教之事件可也真多的很！求好天主為我設法賜一會晤良機，匆匆此敬復。跪求降福。萬桑兄弟敬叩。九、一九」

按雷神父受洗名 Vincent，自譯為萬桑；又所創耀漢會，會士彼此互稱兄弟，且廢姓，茹素。此信用「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」信箋。最後委員長決定請雷神父籌組「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」，直屬軍委會，並囑雷神父一切與戴雨

農先生聯繫。

十月廿八日又有一函致于主教云：

「極敬且愛之好主教：我們五十來人正在拚命設法尋船、尋船。即赴渝。懇求我可愛主教無論如何先勿返昆明！想見之情，無可以形容呵！此先跪求降福。

末神子萬桑兄弟敬叩。十、廿八。」

雷神父極熱情，又極愛國，念念不忘一手創辦的益世報。徒以不得其人，在滇在渝，均無起色。經營不善與經濟拮据，造成惡性循環，使報務陷於困境。民國三十年春，余養河南充西山本篤會，得于主教六月六日來函，囑向順慶王主教借款，可見窘狀，函云：

「杰人：成都講學歸來，忽又兩周。想起居順適，德業進步為禱。教部委託之著作，想已動筆。經濟情況如何，亦希函知。既不須守夜，宿疾必見痊可。何時賦歸？便中函告。益世報經濟甚感困難，而美國方面之月報，亦需接濟，故最近如無辦法，整個陷於失敗矣。年來我教抗戰局面，繫於此類工作，如無法繼續維持，關係必大。順慶區年產食糧頗多，值此米價高於一切之際，能否挪借少許？戰後暨選，絕不食言，且可月利若干，與銀行存款無異。望便中向王牧問接透露此意，飛函告我。……渝市僅存之慈母堂已毀；若慈堂防空洞中落彈三枚。昨夜襲五小時，公共防空洞中空息喪命者數千人，嗚呼慘矣！順祝主佑。于斌手書。六月六日。」

辦報報國為雷、于二公宏大志願，最後乃至以告貸度日，艱苦之狀，不堪設想。抗戰本是艱苦之事，否則不成其為抗戰。偶一回憶，苦中自有樂趣也。

六、一個教外學人的看法

效借一教外友人之言，以結束此文。

陳叔諒先生(訓慈)原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，抗戰後，改任國立浙江大學教授。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自廣西宜山來函云：

「杰人先生司鐸大鑒：七月間永康一晤，未及奉書，瞻望德輝，無任神馳。國難方殷，有待救濟，環顧慈善團體與個人之施捨，惟天主教會與信徒之業最廣，而心最虔，豈惟裨惠災黎，抑且有助抗戰精神與國際輿論。嘗思撰天主教與抗戰一文，以教外人作宣揚之公論，然材料不備，識力不足，不足語此也。……過桂林時，因代浙大圖書館買書，句留五天，不料兄亦以數天內蒞止桂省。如稍多留，當可晤教。頃展大札，知已首途入滇。滇省開教雖稍晚，然永曆帝通使教宗，遺型可仰，兄到後，必能更張木鐸，宏揚教務，而救濟疾苦，宣導民智，其為效必更及遠。……廣州遽失，武漢繼退，瞻念前途，百感交集，而難民填塞，知必更為仁者所憫念籌思者也。」

三十七年後，重讀篋中舊識，一一如在目前，真所謂「百感交集」也。